

于“自由”处觅自由：论《在路上》的追梦精神

黄开红

内容摘要：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书就是一幅幅处于社会边缘底层的主人公在“自由”国土上追逐个人精神自由和幸福的风俗画，也是个人在美国历史特定时期（1947—1950年）追逐“美国梦”的一种体现。从叙述者“我”的视角来看，主人公追逐个人精神自由的整个过程可以用“游戏态度”的模式进行分析，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主题思想则可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来进行解读。主人公在不同场合所表现出的不同行为就像在不同场合所进行的游戏，而叙述者针对不同行为的矛盾态度就是进行伦理选择时主人公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表现。从“游戏态度”模式来看，小说展示了美国社会底层边缘劳动群体生活的生动画面，特别展示了这个群体在二战结束后社会环境中的精神生活追求游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在那段历史时期美国自由社会中的不自由性，探讨和赞美了人性中为了自由而不顾一切的追梦精神。

关键词：《在路上》；游戏态度；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追梦精神

作者简介：黄开红，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和美国文学研究。本文系西南科技大学社科基金资助成果【项目批号：13SXT023】、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美国文学作品中‘美国梦’和‘黑人美国梦’研究”【项目批号：SCWY13-02】和四川省社科联项目“美国文学作品中‘美国梦’游戏理论研究”【项目批号：SC13XK4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Pursuing Freedom in the “Land of Liberty”: On Dream-pursuing Spirit in *On the Road*

Abstract: *On the Road* by Jack Kerouac is composed of many vignettes, in which the main characters from lower or working class backgrounds pursue their spiritual freedom and happiness. It is also an embodiment of the individual pursuit of an alternative American Dream in the 1947-1950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narrator's ("my" in the novel) perspectiv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dividual pursuit of spiritual freedom can be analyzed through the "Game-playing attitude" pattern, and the gist of the novel can be understood by means of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The main characters' different behavior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re just like situational games, and the narrator's paradoxic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main characters' different acts reflect that the individual freedom pursuing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social realities concerning their ethical selections. In a certain sense, the novel draws a vivid picture of life of certain working class groups from the marginalized social bottom of American society. It highlights this special group's spiritual pursuit in the United States immediately after World War II. It also reveals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individual state of not being quite free in a land of liberty during that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it explores and praises the human being's fearless dream-pursuit of the

spirit of freedom.

Key words: *On the Road*; game-playing attitud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selection; dream-pursuing spirit

Author: Huang Kaiho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 focuses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3458060290@163.com.

在美国文学作品中，特别是美国立国之后的西部大开发运动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美国梦”的主题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尽管不同时期、不同种族、不同作者对美国梦的阐释或表现方式大相径庭，而且大多以悲歌的方式诘问美国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有学者以“美国噩梦”^①字样为题来解析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美国梦”，但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以美国下层特定劳动群体的日常生活为素材，对20世纪中叶的“美国梦”追梦精神进行了生动、直观、富有创意的诠释，同时还留给读者一丝淡淡的思虑——人有时为何会莫名地思念什么？人的精神追梦何处才是尽头？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于1957年出版，共分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分别是1947年至1949年的事，叙述了萨尔·帕拉迪斯（即故事叙述人“我”，一名大学毕业不久、喜爱写作的青年）同迪安·莫里亚蒂（一名刚从少管所释放出来的、想学习写作的青年）在纽约初次见面相识，之后帕拉迪斯便在迪安的吸引下数次进行了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横跨美国大陆的旅行经历。第四部分记述了“我”、迪安以及朋友斯坦·谢泼德共同开车南去墨西哥城追梦，体验“伟大的旅程”。第五部分，述说了“我”在墨西哥城生病了，但迪安独自驾车返回了美国，后来“我”也独自返回美国纽约。尽管小说叙述人帕拉迪斯的英文原意有“天堂”、“乐园”、“极乐”之意，但最后一段以“我”伤感的、令人回味的内心独白结束了整个故事，意味着人生过程的捉摸不定，不过每个人都应主动去追求自己的“乐园”，哪怕最后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怨无悔。

《在路上》生动地表述了“人生如戏”、“人生无常”、“人生如梦”、“人生就要追梦”等思想内涵。小说是对当时美国知识分子在“冷战”歇斯底里的伦理环境下的一种伦理选择的生动写照，其中它对普通下层边缘劳动者的“追梦”过程表述得尤为自然、贴切、可信。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认为，“文学通过想象而虚构的艺术世界描写社会和人生，始终同伦理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19），而由席勒所倡导的“游戏说”理论，则从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方面解答了生命活动过程的相对性意义。本文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历史辩证角度出发，以“游戏态度”模式为分析方法，分别针对小说中的一些相关细节，就“倡导种族平等自由思想”和“自由追逐个人幸福梦想”两个方面的伦理选择展开论述，以期归结出小说旨在传递的中心意义：普通劳动者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以游戏的态度参与各种不同场合、不同层次的游戏活动，在伦理畸形的美国社会文化生活中掀起了反主流文化的思想巨浪。

众所周知，人人向往的“美国梦”的精华，就是提倡“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思想。

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移民满怀理想来到美国，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展开了他们的奋斗游戏。此处的游戏，是借用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席勒的定义。席勒当时所处的德国社会与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状况类似，都处在政治高压的伦理环境中，因而他将康德的游戏说向前推进，首先倡导了审美游戏理论，将游戏“定义为从强制那里解脱，同纯粹功利性行动的对抗，进一步说是：定义为一种行动，其目的并非在自身内部，而在外部”（萨弗兰斯基 376）。人在游戏时，人的“本能的严肃——性欲，攻击性——以及对于死亡、疾病和没落的恐惧，由此会失去其强迫性的和剥夺自由的威力”（萨弗兰斯基 376），也就是说，席勒是将审美的游戏冲动当成人性解放的前提。他曾有这样的名言——“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 90）。参与“美国梦”游戏的人们，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积极的行动，意味着他们都是充分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因而主动做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伦理选择。

然而，非洲黑人（还包括其他有色人种）的“美国梦”却被美国的社会体制以及相关法规给排除在奋斗游戏之外了。黑人在美国的遭遇是一种不体面的历史遗留问题，虽然从制度和法律上来说，该问题早就得到了解决，然而事实上的不平等、不自由却是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的。小说虽未就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论争，但其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却明显地体现出“倡导种族平等自由”、“反对种族歧视隔离”的思想主张。以下面一例为证：“雷米住的米尔市在山谷里，由一批棚屋组成，原是大战期间为海军船坞的工人们建的住房工程；它位于一个很深的峡谷里面，山坡上种了许多树。居住小区里有专用的商店、理发店和成衣店。据说，这里是美国唯一的白人和黑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混住在一起的社区；确实是这样，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如此自由欢乐的地方了”（凯鲁亚克 78）。此处所描写的特殊社区，就有可能是战争期间白人和黑人混居后遗留下来的特殊结果。这个社区给“我”的印象是“自由欢乐”！可以说，这种“种族平等自由”的思想与后来小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②是一脉相承的。马丁·路德·金是1963年讲出这种想法的，而《在路上》里的“我”表达这种思想是1947年，比小马丁·路德·金大声疾呼他的“梦想”的时间还早了十六年，倡导了种族平等自由思想。

除了对旧金山米尔市白人黑人自由混居社区的描写外，书中所体现种族平等自由思想的描写不胜枚举。例如，书中写到“我”有一次独自一人无聊地在黑人社区溜达时，“希望自己也是黑人，因为我觉得白人世界给我的最好的东西不足以让我入迷，没有足够的生活、欢乐、刺激、罪恶、音乐和足够的黑夜……我希望自己是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甚至是穷苦的、过分劳累的日本人，什么人都行……在这个难以忍受的甜蜜夜晚，在紫色的黑暗中沮丧地溜达，希望我能同那些快乐的、真诚的、心醉神迷的美国黑人交换世界……”（凯鲁亚克 232）。“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黑人或其它有色人种的一份子，希望生活中有“足够的黑夜”可以让自己有自由自在的感觉。从这点来看，书中所反感的是那种平庸乏味、安于现状、人云亦云的保守传统价值观，提倡的是一种欢乐刺激、生机勃勃、积极主动地体验生活的理念，主张无论哪个种族的人，都应该平等地自由快乐地生活，不应该有种族歧视，因为种族歧视就意味着不平等、不自由。这样的理念在那个时代自然而然被当局视为离经叛道、有伤风化、有害社会，故而被大加贬抑和排斥，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述，20世纪中叶的美国正经历着战后“冷战”的苦闷期，民主受到压制、冷战歇斯底里肆虐，“一方面，形式上的民主繁荣兴旺，另一方面，当时真正的重大问题被排斥在（可进行公开辩论的）选择范围之外”（27）。《在路上》

以及其他“垮掉的一代”作者如金斯堡的《嚎叫》等作品,触及到了当局正统价值观的痛处,被斥为“离经叛道”,“克鲁亚克被指责为真正的神经错乱、综合性病症的牺牲者,鼓吹欺骗、犯罪,作品毫无意义,犹如垃圾等等”(文楚安 63)。其实,《在路上》等“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成后来举世瞩目的美国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一系列自由民主运动的重要文化导火索之一,给当时美国的冷战歇斯底里投下了一枚反文化运动的重磅原子弹,对美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难怪“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1960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垮掉分子’(Beatniks)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文楚安 3)。

二

《在路上》所表现的众多主题之中,追逐个人自由幸福生活绝对是其倡导的主基调,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追求又是美国宪法赋予其公民的基本人权,也是美国梦的重要感召力之一。书名《在路上》本身就反映出了人生的寓言,那就是,人一旦出生于世,就意味着他已经毫无例外不由自主“在路上”了,并且必然要“在路上”经历由生到死这个过程。作者选用 road 而非 way 就暗示着生命本身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人一旦出生就必然要生活运动下去(除非死亡),每个正常人偶然的生命过程必然要“在路上”去经历人生的七情六欲酸甜苦辣,而且都需要亲自去体验这种过程。从自然史这个总体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绝对是毫无意义可言,只不过既然出生不由自主,就一定要向前进,毫无别的选择,直到生命尽头。而在生与死这一过程的“路上”,关键是所选的“路”因人而异,对每个人来说,自己所选的路就是自己的“梦想”之一,一种至少对选择者而言是值得付出的具有某种相对意义的理想之路。人生过程就像是在玩一种自己认为值得一玩的游戏,个人可以选择游戏的方式和对象,也可以选择主动还是被动的态度来参与该游戏,这点正如聂珍钊教授所提出的“伦理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6)。当然,在生与死这一总的游戏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将人们的每种言语行动以及思想思维活动等看成是某种不同层次和不同规模的游戏,其间每个人的“路”可能会不断变化,但是,一旦做出选择,就应该在一定场合义无反顾地玩下去。人人都在探求自己的“路”,正如《在路上》所描写迪安对“我”所说的话:“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路。那是一条在任何地方、给任何人走的任何道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凯鲁亚克 321)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投身其中的几次主要活动,都是他们选择主动游戏的表现,尽管在各种游戏过程中又有一些被动参与的情况,而且尽管每种游戏的结局都各不相同,但游戏的总体目标基本上都是为了追求并达到人生自由理想的生活状态,特别是达到追求自由平等之梦的理想精神生活这一具有相对意义的目标。

《在路上》中“我”与迪安·莫利亚蒂在纽约见了第一次面后,对他的身世、个性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想进一步与他交往,并从中体验一种新的生活经历,即通过去体验迪安这类边缘人群体的生活,以期获得写作的灵感,因此做出了“上路”的伦理选择。“随着迪安·莫利亚蒂的到来,开始了可以称之为我的在路上的生活阶段。在那以前,我常常幻想去西部看看,老是做一些空泛的计划,从来没有付诸实践”(凯鲁亚克 3)。身为作家,“我”一直只计划而无行动,因为一直没有找到足够让“我”进行“上路”游戏的理由。但自从遇到迪安后,“我”觉得到西部去体验生活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我”心里,“迪安是旅伴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的的确确是在路上出生的”(凯鲁亚克 3)。此

外，迪安给“我”的感觉“仿佛是个走散多年的兄弟”（凯鲁亚克 10），尽管我们的性格有较大差异。从实际情况来说，迪安是个社会底层的少年犯，他“为了面包和性爱在社会上使劲拼搏”（凯鲁亚克 11），他表现出的是一种精力充沛、生龙活虎的下层边缘劳动者形象，只不过他的行为举止与传统观念相抵触，被看作另类、疯子和罪犯。不过，在“我”眼里：“……迪安的智力十分正常、完整、熠熠生辉，没有那种讨厌的知识分子腔调。他的‘犯罪行为’不会惹人愠怒和嗤笑，而会引起一阵狂野的美国式的喝彩；它有西部情调，西部风味，……是来自平原的颂歌，某些早有预示、正在实现、含有新意的东西（他只是为了乱兜风才偷汽车）”（凯鲁亚克 11）。总之，“我”对迪安甚是着迷，正是他将“我”引向西部，助“我”将空泛的计划立刻付诸实践，他是“阳光的西部亲属”（凯鲁亚克 11），他给了“我”上路的信心，尽管“我”姨妈提醒说他会给“我”招来麻烦，但“我”都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我”的首次西部之旅，并且坚信自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知道会有女人，会有幻象，会有一切；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明珠会交到我手中”（凯鲁亚克 12）。通过自己的伦理选择，“我”觉得迪安使“我”的生活有了新意义，使“我”对“在路上”的生活越来越着迷，使“我”的精神生命越来越充满活力。

令人奇怪的是，“我”原本是冲着迪安开始“我”的首次西部之行的，然而“我”第一次到西部时只在丹佛与迪安进行了短时间的会面，而其余时间大多是在旧金山米尔市与朋友雷米及其女友一起度过的。“我”到丹佛时，迪安正忙得不可开交：他同时要与两个情人和一个名叫卡洛·马克斯的铁哥们进行交往，只是在“我”要离开丹佛向旧金山出发的最后一分钟，迪安才打来电话说“他和卡洛有可能在海岸同我会合；我回想了一下，发现我和迪安的谈话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五分钟”（凯鲁亚克 76）。

“我”在丹佛未能与迪安进行深入的结交，意味着我的第一次西部追梦游戏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却体验了一段在旧金山当临时警察的经历。此外，在离开旧金山之后，“我”又遇到了一位同样“在路上”的墨西哥姑娘特雷，与她碰撞出了难以忘怀的浪漫感情，同她度过了一段下层劳动者艰辛但充实甜蜜的生活，丰富了自己的阅历。虽然“我”与该姑娘浪漫交往的时间很短，但“我”也亲历了她那个下层劳动阶层的人们生活现状：贫困但朴实快乐。乍看起来，“我”不过是个小偷、流氓、流浪汉而已：在当临时警察时与朋友一起去偷东西；流浪旅途中又乘机勾引落魄的姑娘。实际上，这正是书中试图传达出的矛盾生活的写照——“我”的行为目的是尽力在“自由”的土地上追逐自由的梦想，但严酷的现实却将“我”的自由之梦撕得粉碎：“我”知道自己保不住临时警察的工作，为了避免被开除的难堪而先提出辞职；“我”和那位墨西哥姑娘虽然情投意合，并决定一起到纽约去共同生活，然而现实中“我”和她分属不同社会阶层，她的家人绝不可能同意她跟我交往，更不用说一同去纽约生活了。

纵观全书，最为精彩的游戏莫过于有迪安参与的任何一场活动。作为刚从少管所里放出不久的“问题青年”，迪安并没有对生活绝望，而是主动选择去追求积极的生活，还孜孜不倦地要学习写作。与迪安相互了解后，得知他最想做成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他失散多年的父亲——流浪汉老迪安·莫利亚蒂。书中对老迪安的描写虽着墨不多，但每一部分都有提及，并且每一次描写都给人留下一种漂泊不定的、象征自由的意味。

老迪安·莫利亚蒂本是丹佛一名勤劳体面的白铁工，后来嗜酒成瘾，最后落魄成了货运卡车司机，冬天开车去德克萨斯，夏天开车回丹佛。再后来，他就成了一个流浪汉而永远失去了行踪。迪安告诉“我”说：“有一次我搭货运车从新墨西哥到洛杉矶——当时我

十一岁，在一条侧线上和我父亲走散了……”（凯鲁亚克 180）。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老迪安就再也没有了踪影，而迪安也一直到处打听他老父亲的下落。受到迪安的影响，“我”每到一处也试图寻找到老迪安。下面是“我”在丹佛独自漫步时的心理思绪：“黄昏时，我信步走去。觉得自己像是这个凄凉的红色地表上的一个斑点。我走过温萨旅馆，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迪安·莫里亚蒂和他的父亲曾住在这里，我遥想当年，到处寻找我心目中的那个悲哀的传奇般的白铁匠……”（凯鲁亚克 231—232）当我们在旧金山一个酒吧里看到几个老流浪汉时，迪安想到了他的父亲，“我认为他就在丹佛——这一次我们必须找到他，他可能被关在县监狱里，也可能回到拉里默街一带流浪，但我们必须把他找到”（凯鲁亚克 245）。当我们开着车去芝加哥途中看到铁路旁边有一帮老流浪汉时，迪安对“我”说道，“你明白，我永远不知道我的老爸是不是在那帮人里面……我不知道该不该打听。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凯鲁亚克 298）。当我们开车到达芝加哥并置身于麦迪逊街一群流浪汉中时，迪安又叫“我”“多加注意，看看有没有老迪安·莫里亚蒂，今年他可能碰巧在芝加哥”（凯鲁亚克 305）。从这些描写来看，迪安对找到自己父亲的希望一次比一次渺茫：开始是满怀信心的“必须”找到，后来降格为“可以”找到，最终的结果却是“可能碰巧”找到。这些描写从一定角度反映出，迪安那位正在流浪而不见踪迹的老父亲就是一种自由的象征，而书中的几个主人公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选择进行追逐自由的游戏，令人遗憾的是，最后似乎谁也没有找到想要的自由。

寻找父亲是迪安念念不忘的一种心病，而他在生活中给人们的印象却是一个精力无穷的乐天巨人，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符号。由于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到处流浪，没条件受到良好教育，在伦理取向上偏重于人的本能的满足，因此，精力旺盛的他从13岁起就开始偷汽车，到17岁时创下丹佛偷车记录之最——曾偷过500辆车。不过，他偷车仅仅是为了展示他的驾车技术，为了寻刺激和吸引小女生。他是他们那帮孩子心目中的英雄。从少管所出来后，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精神游戏方面，做出了追逐自由的新的伦理选择。他所到之处总是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做出的事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比如他与卡洛·马克斯情绪高昂的彻夜漫谈；他与他那帮儿时伙伴们通宵达旦的酗酒闹腾；他在听流行音乐时的欣喜若狂；他在听到美妙演奏时的如痴如醉；他在高速路上的玩命飙车；他时而像灵魂出窍般陷入深思，让人琢磨不透，时而又像玩魔术般敏捷地完成一连串动作……他可以一时冲动或为了朋友而抛妻弃子，或为了强烈的感情体验而抛弃生命，也可以完全没来由地突然抛开朋友，尽管他们当时的确需要他的帮助。总之，迪安在行动上的表现完全像个疯子、狂人，一个“神圣的傻瓜”^③。

同书中其他主要人物一样，这个“神圣的傻瓜”带给人们的是一种为了自由的梦想而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地付诸行动的勇者精神，他在即使不那么自由的土地上也执着地追逐着个人自由，富有激情地去玩“在路上”的每一场游戏，而这些游戏很多都集中在精神思索的层面，追问着人生的意义。尽管迪安在“我”重病时仍将“我”扔在了墨西哥城独自返回美国，但书中最后一句话还是透出“我”对迪安的一丝淡淡的思念，“……除了衰老以外，谁都不知道谁的遭遇，这时候我想起了迪安·莫里亚蒂，我甚至想起了我们永远没有找到的老迪安·莫里亚蒂，我真想迪安·莫里亚蒂”（凯鲁亚克 394）。在此，作者进一步将迪安本人也当成了自由的象征。尽管在自由的土地上，主人公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自由，但这种追梦精神游戏却永远激励着所有的追梦者不断为自己的梦想主动去“上路”。

注解【Notes】

- ①关于“美国噩梦”，参见 Kathryn Hum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Nightma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②关于“I Have a Dream”，参见 Harold B. Allen et. al., eds, *English for Today* (Book 5), 2nd ed. (Singapor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6) 180。其中有这样一句话：“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
- ③关于“神圣的傻瓜”，参见凯鲁亚克：《在路上》，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249原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小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
[Dickstein, Morris. *Gates of Eden*. Trans. Fang Xiaogua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86.]
-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Kerouac, Jack. *On the Road*. Trans. Wang Yongni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 (2004): 16-24。
[Nie Zhenzhao. “Ethical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 Perspectiv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4): 16-24.]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席勒传》，卫茂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Safranski, Rüdiger. *Life of Friedrich Schiller*. Trans. Wei Maopi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 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
[Schiller, J. Friedrich. *Letter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rans. Xu Hengchun.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
- 文楚安：《“垮掉一代”及其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Wen Chu'an. *The Beat Generation & Others*. Chengdu: Sichuan UP, 2002.]

责任编辑：何 年